



实用主义的儒化

现代新儒学与杜威

The Confucianization of Pragmatism

Modern New Confucianism and John Dewey

顾红亮 /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实用主义的儒化

现代新儒学与杜威

The Confucianization of Pragmatism

Modern New Confucianism and John Dewey

顾红亮 /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实用主义的儒化：现代新儒学与杜威 / 顾红亮著

·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12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ISBN 978 - 7 - 5097 - 9777 - 8

I. ①实… II. ①顾… III. ①新儒家 - 关系 - 实用主

义 - 研究 IV. ①B087②B244.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35320 号

·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

实用主义的儒化

——现代新儒学与杜威

著 者 / 顾红亮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宋月华 袁卫华

责任编辑 / 袁卫华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人文分社(010)59367215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16 字 数：251 千字

版 次 /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201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9777 - 8

定 价 / 89.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设立的一类重要项目，旨在鼓励广大社科研究者潜心治学，支持基础研究多出优秀成果。它是经过严格评审，从接近完成的科研成果中遴选立项的。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影响，更好地推动学术发展，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目 录

第一章 现代新儒学的实用主义背景	1
一 研究视角：同时代性	1
二 研究对象：现代新儒学与实用主义	10
三 研究问题：生存、生活与生命	34
第二章 民族生命的生存进化	39
一 杜威与达尔文进化论的哲学意义	40
二 作为科学的进化论	44
三 作为价值的进化论	54
四 作为方法的进化论	65
第三章 民族国家的政治生活	80
一 杜威的五四话语	82
二 民族国家认同与文化自觉	101
第四章 生活睿智与反省思维	119
一 思维、民主与睿智	120
二 实验逻辑	125
三 中和 - 通论	131
四 胸襟自由论	135
五 像中国人那样思考	140
第五章 生命教养与生活方法	143
一 杜威与“生命哲学”	145

二 梁漱溟与生命教养	159
三 冯友兰与生活方法	169
四 生命的生长逻辑	181
 第六章 生命理想与宗教性	189
一 “宗教”与“宗教的”	190
二 天地境界	200
三 超越的形上学	207
四 道德的形上学	210
五 终极的自我转化	215
 第七章 实用主义的儒化之径	222
一 影响研究模式与对话研究模式	222
二 生存之境、生活之境与生命之境	225
 参考文献	238
 索 引	244
 后 记	247

第一章 现代新儒学的实用主义背景

本章是全书的导论。

本导论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讨论本课题的研究视角，综述本课题的研究现状，引出本书采用的主要研究方法，即“同时代性”视角，以与历时性的研究视角相区别。二是讨论本课题的研究对象，即现代新儒家和杜威实用主义；介绍“pragmatism”一词的中文翻译，呈现实用主义哲学在中文语境中的多维特征，并讨论现代新儒家群体的面相和思想特征以及这一群体与杜威之间的复杂关系。三是讨论本课题的研究问题，提炼问题意识；具体讨论现代新儒家与杜威共同关注的几个实践哲学问题，对本课题设定的研究主题及其意义做一些解释，引出“实用主义的儒化”概念，并就全书的论述框架和构思做一些说明。

本章的题目把实用主义视作现代新儒学的另一重西学背景。这里所说的“背景”有双重意思。一是指时代背景。杜威的实用主义和现代新儒学共处一个中西文明互动与沟通的时代，具有共同的时代背景；从另一个角度看，实用主义所处的时代背景与现代新儒家所处的时代背景还不完全重合，前者在一定程度上构成后者的一个背景，前者的时代问题意识对后者具有启发和激发意义。二是指思想背景。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成为一部分现代新儒家构思的一个重要思想资源，两者有交流与交锋，有吸收与批评，前者构成后者的一个思想背景。

一 研究视角：同时代性

对现代中国人来说，杜威（John Dewey）及其实用主义这两个名词并不陌生，它们在中国人的现代思想世界里占据了重要的位置。贺麟在1986年坦言：“在现代西方哲学各家各派中，对旧中国思想界影响最大的应该首推杜威。”^①

^① 贺麟：《中译本贺麟教授序》，载〔美〕罗蒂《哲学和自然之镜》，李幼蒸译，商务印书馆，2003，第7页。

在过去的 30 多年时间里,无论是在美国、欧洲还是在中国,人们对杜威哲学和实用主义哲学的兴趣有增无减。

在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普特南(Hilary Putnam)、奎因(Willard Van Orman Quine)、理查德·伯恩斯坦(Richard J. Bernstein)、理查德·舒斯特曼(Richard Shusterman)等哲学家的努力下,实用主义哲学在美国得到一定程度的复兴。在罗蒂的《哲学和自然之镜》中,杜威被视作与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并驾齐驱的 20 世纪三大著名西方哲学家之一。^① 拉里·A. 希克曼(Larry A. Hickman)在此论断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在这三位哲学家中,只有杜威撰写大量公共哲学论著,只有杜威提出一套教育哲学,只有杜威设立相关的项目改良社会。”^② 在舒斯特曼的《哲学实践》中,杜威被视作与维特根斯坦、福柯(Michel Foucault)并列的 20 世纪西方哲学三大潮流(实用主义、分析哲学和大陆哲学)的代表,他们三人也代表了“20 世纪西方哲学的三个不同但又交叉重叠的阶段”^③。罗蒂从杜威哲学中吸取灵感,阐发他的“后哲学文化”理论,舒斯特曼从杜威哲学著作中受到启发,发挥他的“身体美学”。

在欧洲,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对于从皮尔士(Charles Sanders Santiago Peirce)到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和杜威的美国实用主义的关注也足以让我们相信实用主义在当代欧洲的影响力。^④ 在中国,无论是杜威哲学的研究、实用主义哲学对中国哲学的影响的研究还是对杜威的中国之行的历史研究都成为受人关注的话题。

10 多年来,国内出版界相继出版了一些有关杜威在华讲演的参考性书籍,如《杜威五大讲演》(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 年)、《杜威谈中国》(沈益洪编,浙江文艺出版社,2001 年)、《民治主义与现代社会:杜威在华讲演集》(袁刚、孙家祥、任丙强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年)等。与此相关,杜威的一些论著也不断再版或被翻译出版,如《确

① [美] 罗蒂:《哲学和自然之镜》,第 3 页。

② Larry A. Hickman, *John Dewey's Pragmatic Technology*,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198.

③ [美] 理查德·舒斯特曼:《哲学实践》,彭锋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第 13 页。

④ 参见童世骏《写在〈确定性的寻求〉中译本再版之际》,载 [美] 杜威《确定性的寻求》,傅统先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第 5 页。

定性的寻求》（傅统先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和《经验与自然》（傅统先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等书再版，《艺术即经验》（高建平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评价理论》（冯平、余泽娜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等著作被翻译出版。此外，《杜威文选》（涂纪亮编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意义、真理与行动——实用主义经典文选》（苏珊·哈克主编，东方出版社，2007年）和《实用主义》（杜威等著，杨玉成、崔人元编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等一些实用主义论著选编也接连出版。在相关出版物中，最具重要意义的是《杜威全集》中译本的问世，目前，由刘放桐主编的《杜威全集·早期著作（1882—1898）》（5卷，2010年）、《杜威全集·中期著作（1899—1924）》（15卷，2012年）、《杜威全集·晚期著作（1925—1953）》（17卷，2015年）已经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

2000年以来，国内出版的研究杜威思想的著作或论文集已有数本，如陈怡的《经验与民主：杜威政治哲学基础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孙有中的《美国精神的象征：杜威社会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张云的《经验·民主·教育——杜威教育哲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刘华初的《实用主义的基础：杜威经验自然主义研究》（人民出版社，2012年）、张立成的《杜威的心灵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庞丹的《杜威技术哲学思想研究》（东北大学出版社，2006年）、杜祖贻的《杜威论教育与民主主义》（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俞吾金主编的《杜威、实用主义与现代哲学》（人民出版社，2007年）等。

查阅中国知网上的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可以发现，近10年来，国内有关杜威哲学研究的博士学位论文大致有余泽娜的《经验、行动与效果的彰显——杜威价值论研究》（复旦大学，2005年）、田光远的《科学与人的问题——论约翰·杜威的科学观及其意义》（复旦大学，2005年）、马如俊的《论杜威的自然主义伦理学》（复旦大学，2006年）、孔祥田的《经验、民主与生活——杜威政治哲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2006年）、李志强的《杜威道德教育思想研究》（中国人民大学，2006年）、张梅的《杜威的经验概念》（复旦大学，2008年）、肖晓玛的

《杜威美育思想研究》（南京师范大学，2008年）、张奇峰的《以“道德自我”概念为核心的杜威道德哲学研究》（复旦大学，2010年）、郑国立的《杜威：作为生活方式的民主——论杜威在政治哲学上的变革》（复旦大学，2010年）、高来源的《论人在经验世界中超越》（黑龙江大学，2011年）、刘文祥的《杜威的经验概念研究》（吉林大学，2013年）等。这些信息大致表明近10年来当代中国研究者对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有较浓厚的兴趣。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出版了一套实用主义研究丛书，由孙有中、安乐哲、彭国翔主编，该丛书给当代中国学术界的杜威热带来新的视野。这套丛书包括斯蒂文·C. 洛克菲勒（Steven C. Rockefeller）《杜威：宗教信仰与民主人本主义》（*John Dewey: Religious Faith and Democratic Humanism*）、罗伯特·威斯布鲁克（Robert B. Westbrook）《杜威与美国民主》（*John Dewey and American Democracy*）、詹姆斯·坎贝尔（James Campbell）《理解杜威——自然与协作的智慧》（*Understanding John Dewey: Nature and Cooperative Intelligence*）、托马斯·亚历山大（Thomas Alexander）《杜威的艺术、经验与自然理论》（*John Dewey's Theory of Art, Experience, and Nature*）、拉里·A. 希克曼（Larry A. Hickman）《阅读杜威——为后现代做的阐释》（*Reading Dewey: Interpretations for a Postmodern Generation*）、斯蒂文·费什米尔（Steven Fesmire）《杜威与道德想象力》（*John Dewey and Moral Imagination*）、拉里·希克曼（Larry A. Hickman）《杜威的实用主义技术》（*John Dewey's Pragmatic Technology*）、托德·莱肯（Todd Lekan）《造就道德——伦理学理论的实用主义重构》（*Making Morality: Pragmatist Reconstruction in Ethical Theory*）等。还有一些研究杜威的译著陆续出版，例如，拉里·A. 希克曼的演讲集《永远年轻的杜威》（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年）从社会观、探究理论、教育学等角度展示杜威思想的当代意义。

在杜威哲学与现代中国哲学或思想之间关系的比较研究方面，笔者以前做过一点尝试。十几年前，笔者以“杜威哲学对近代中国哲学之影响”为博士学位论文（1999年）主题做过一段时间的研究，研究成果反映在《实用主义的误读——杜威哲学对中国现代哲学的影响》（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一书中。此书

自 2000 年出版后,学术界有一些反馈,例如,台湾学者杨贞德研究员曾发表书评(参见《中国文哲研究集刊》第 22 期,2003 年)。还有其他一些学者完成或出版了相关的研究成果,例如,张汝伦的论文《胡适与杜威——一个比较思想史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7 年冬季卷)分析胡适与杜威哲学的差异;夏英林完成以《实用主义在中国——从杜威到胡适》为题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山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9 年),该论文从实验逻辑、思维五步法、科学方法、认识论、形而上学五个方面讨论杜威与胡适哲学的关系;元青《杜威与中国》(人民出版社,2001 年)一书,讨论了杜威的中国之行、杜威实用主义哲学与五四思想界的关系、杜威教育理论与 20 世纪 20 年代中国教育的关系等内容;张宝贵编著《杜威与中国》(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 年)一书,介绍了杜威在华经历,也收录了杜威的一些演讲和中国文化界对杜威的一些评论文章;杨寿堪和王成兵合作撰写《实用主义在中国》(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年)一书,较详细地描述了 20 世纪中国学者介绍、翻译、评述或批评实用主义哲学的历史过程。此书的修订版改名为《实用主义的中国之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年)。陈文彬的博士学位论文《五四时期杜威来华讲学与中国知识界的反应》(复旦大学,2006 年)介绍了杜威的中国观、五四时期中国知识界对杜威来华的反应以及受杜威讲学的影响等内容。

在英语世界里,自从 Barry Keenan 的 *The Dewey Experiment in China: Educational Reform and Political Power in the Early Republic*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出版之后,相关的研究专著较为少见。不过,近 10 年来,这一话题似乎又有复苏的迹象,例如,2005 年,Thomas S. Popkewitz 主编了 *Inventing the Modern Self and John Dewey: Modernities and the Traveling of Pragmatism in Educatio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5),此书收录了一篇题为“A History of the Present: Chinese Intellectuals, Confucianism and Pragmatism”(作者为 Jie Qi)的文章,该文简要介绍了杜威实用主义在现代中国的影响。

又如,2007 年, Jessica Ching - Sze Wang 的博士学位论文 *John Dewey in China*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7) 出版,此书的一个特点是花较多篇幅论述杜威在中国的经历对其后来哲学观点(如

民主观点)的影响。Rosa Bruno - Jofre 和 Jurgen Schriewer 编的 *The Global Reception of John Dewey's Thought* (New York, London: Routledge, 2012) 一书介绍了杜威思想在日本、墨西哥、俄罗斯、中国、西班牙等国的接受过程,彰显杜威实用主义的全球影响力。其中第五章以“中国的杜威:朋友、魔鬼、旗舰”为标题,专门介绍从1919年到21世纪初杜威思想在中国的接受程度。在1949年前,杜威被视为中国思想界的朋友,而在20世纪50年代,杜威被妖魔化,被视作毒害人们思想的“洪水猛兽”,20世纪70年代晚期开始,杜威又被视为主张现代化的旗舰代表。^①

从论述对象来看,上面提到的研究成果,有相当一部分成果集中于论述杜威与胡适、陶行知、蒋梦麟、陈鹤琴、晏阳初等中国思想家之间的关系。现代新儒家与杜威实用主义的关系等内容尚未引起学术界足够的重视。如果说以胡适为代表的现代思想家侧重从科学化的向度理解实用主义,那么,现代新儒家对实用主义的解读则带有儒化的意味。

就儒学与实用主义的关系,孟宪承在1934年的一篇文章中指出:“至于培养人格,磨砺精神那些话头,我以为最好不要犯作空谈爱唱高调的老毛病,只要保存我们儒家躬行实践的态度,多致力于人格上的感化,这和实用主义不必抵触,而应当并行不悖……”^② 孟宪承挑明儒学和实用主义并行不悖的观点,但是没有给出具体的论证。

在杜威实用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尤其是儒学的比较研究中,郝大维(David Hall)和安乐哲(Roger T. Ames)的研究是引人注目的。安乐哲在《先贤的民主》(与郝大维合著)和《和而不同:比较哲学与中西会通》等书中提出了杜威实用主义与儒学对话的设想,也给出了一些具体的研究成果。例如,安乐哲说,儒学与杜威的实用主义存在着很多共鸣之处。“这些彼此共鸣的词汇包括‘experience’和‘道’,‘consummatory experience’、‘democracy’和‘和’,‘personality, individuality, and equality’和‘仁’,‘religiousness’和‘礼’,‘processual human nature’和‘人性’。并且,在更广的意义上来看,双方似乎还有许多会通之处:

① *The Global Reception of John Dewey's Thought*, edited by Rosa Bruno - Jofre and Jurgen Schriewer, New York, London: Routledge, 2012, p. 83.

② 孟宪承:《现代教育上两大思潮》,载《孟宪承文集》第1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第318页。

像人类经验不可化约的社会性、情境对于作用的优先性、有效沟通的核心重要性、替代了目的论的向善的连续性。”^① 另外,《先贤的民主》一书指出,在实用主义与儒学之间存在着的共通的观点包括种族中心主义和叙述的重要性、社会接触交往、自我教化、谏议义务、传统的重要性、一种民主的视野。^② 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观点是:杜威与孔子对话的成果是儒家民主(Confucian Democracy)。^③ 安乐哲在单篇论文中讨论过如何借助唐君毅与杜威的思想资源来审视儒家民主观念。^④ 另一位学者 Sor-hoon Tan(陈素芬)以《儒家民主》专著形式详细发挥了这个观点。^⑤ 这些研究在海内外引起了较大的反响,开辟了杜威实用主义哲学与儒学比较研究的新路。

除了安乐哲等学者的努力外,李泽厚也表现出对杜威实用主义哲学的较大兴趣,他明确表示支持安乐哲所从事的杜威实用主义和儒学的比较研究。在《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一书中,他甚至主张复活杜威哲学,把它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儒学传统融合起来,构建人类学的历史本体论。^⑥ 李泽厚在比较研究中指出,马克思主义和杜威哲学在与儒学传统的相通方面有许多共同点,例如,他们都重社会群体,轻独立个人;重力行实践,轻逻辑玄理;重效用真理,轻执着教条;重现实经验,轻超验世界,当然,两者也有不同之处,如马克思主义承认世界的客观规律和对未来怀有大同理想,在这两点上,马克思主义比杜威哲学更容易接近儒学传统。在现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融合“不但不排斥,反而可以更顺利地吸取杜威”^⑦。

① [美] 安乐哲:《儒学与杜威的实用主义:一种对话》,载[美] 郝大维、安乐哲《先贤的民主》,何刚强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第181~182页。

② [美] 郝大维、安乐哲:《先贤的民主》,第82~92页。

③ [美] 安乐哲:《和而不同:比较哲学与中西会通》,温海明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第214页。

④ 参见 Roger T. Ames, "Tang Junyi and the Very 'Idea' of Confucian Democracy," in *Democracy as Culture: Deweyan Pragmatism in a Globalizing World*, edited by Sor-hoon Tan and John Whalen-Bridge,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8, pp. 177-199.

⑤ Sor-hoon Tan, *Confucian Democracy: A Deweyan Reconstruction*,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4.

⑥ 李泽厚:《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三联书店,2005,第20页。

⑦ 李泽厚:《己卯五说》,中国电影出版社,1999,第23~24页。

尽管如此,李泽厚仍然认为,对儒学与杜威哲学的比较研究对于中国文化的发展是有益的。他对两者所做的比较研究集中在“实用理性”(pragmatic reason)概念上。他曾用这一概念描述中国文化心理的基本结构。中国有一个历史悠久的“实用理性”的传统。他认为,在强调实践操作活动和反对先验理性方面,在将有用性当作真理的标准方面,“实用理性”与杜威的实用主义相当一致,也就是说,杜威的实用主义与中国传统的“实用理性”有共同点。但是,他批评杜威忽视了历史性形成的心理结构的作用。“实用理性不停留在 Dewey 对生存情境(situation)的确定、处理、解决这一主体实践操作层面,而且要进入由人类历史所积累形成的对世界(自然与社会)的整体把握层面。所以实用理性不是‘实验经验主义’或‘实验室的逻辑’,而是人的历史存在的逻辑。它不属于实用主义,而属于人类学本体论。”^①从对杜威的批评出发,他试图重新阐发中国的“实用理性”,强调对“度”的把握,强调“实用理性”的合理性、历史性与情理交融性。在李泽厚看来,吸收杜威实用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进而实现对“实用理性”传统的“转换性创造”是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

从方法论上看,一些学者,如安乐哲和李泽厚,进行的比较研究是抽象的、概念式的研究,主要是对杜威哲学和古代中国哲学中的重要概念、观念进行对比研究。这是一种跨空间的、历时性的学理研究或哲学研究,具体的时代特征、生活场景和历史背景常常被抽掉了,剩下的是文本、概念和命题的比较。考虑到五四时期杜威在中国进行了为期两年多的访问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我们可以想象,是否有可能进行另一种方式的比较研究,即是否有可能对杜威哲学与现代中国哲学进行比较研究?这样的研究将既考虑到杜威哲学对现代中国哲学的历史影响,又考虑到对两者进行哲学式、概念式的比较研究。这是一种共时性(同时代性)的研究。

对于同时代性研究,冯契说:“当时中国哲学学派之间的论争,就像是西方后黑格尔时代的再版。马克思主义与其他西方哲学思潮在中国的传播,明显地体现了‘同时代’。”“一般地说,在同一时代背景下产生

^① 李泽厚:《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第20~21页。

的各种哲学学派，面临着共同或相似的问题，虽从不同角度提出不同答案而互相对立，但同时又是互相联系、互相影响着的，决不能把它们截然割裂开来。”^① 杜威和现代中国哲学家（如现代新儒家）是同时代的哲学家，具有类似的时代关怀意识和问题意识，可能享有一些共通的洞见。这些意识和洞见将深刻地揭示杜威哲学与现代中国哲学之间进行对话的可能性。这种研究进路不是对前面提到的历时性学理研究的否定，而是一种补充或丰富，进一步推动杜威哲学和中国哲学进行深层次的交流。前面提到的安乐哲对唐君毅和杜威思想的比较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研究的例证。

从研究内容上看，一些学者已经讨论过民主、个人、经验、交往、共同体等概念，它们的确是杜威哲学与中国哲学比较研究的主要议题。在这方面，安乐哲和李泽厚分别从“儒家民主”和“实用理性”观念入手，展开对杜威哲学与中国哲学的比较研究，并提出各自的哲学创见，启人深思。我们把他们的创见看作一个引发多层次更有意义的比较研究的引子，从而期待更丰富的研究成果。

如果我们换一个视角，也就是从同时代性来看，有关杜威哲学与中国哲学的另外一组观念将进入我们的讨论范围，它们是进化、民族国家、生命（生长）、教育、科学（思维）方法、宗教性等。这些观念大多为现代中国哲学家所关注，不少成为中国现代性的核心观念，与现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密切相关，它们很难为讨论现代哲学史、思想史和现代中国史的著作所忽略。从杜威哲学方面看，这些观念并非落在杜威的视野之外。他有专文讨论达尔文进化论对当代哲学的影响，也有一组时评文章讨论中国的民族国家问题和新文化运动问题，他也在一些专著中讨论生长观念和反省思维论。美国学者基南（Barry Keenan）在分析杜威在华讲演内容时指出，现代科学、民主和教育是三个贯穿其中的主题。^② 这些讲演主题的显现与现代中国思想世界的演化有着共生的关系。

① 冯契：《〈马克思恩格斯同时代的西方哲学——以问题为中心的断代哲学史〉序》，载冯契《智慧的探索》，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第597、595页。

② 参见 Barry Keenan, *The Dewey Experiment in China: Educational Reform and Political Power in the Early Republic*,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p. 37.

可以说,上面提到的第二组概念是杜威与现代中国哲学家的共同关注点,是我们在进行比较研究时不应忽视的。尽管在有些观念上,杜威与现代中国哲学家没有产生直接交锋,只是各自谈论自己的看法,但是在这些看法的背后,存在着相似的背景意识,如中国关怀意识和现代性意识。交锋与否并不是一个关键因素,关键在于他们都对中国问题以及在其中体现出来的更为普遍的理论问题做出了有一定创见的回答,成为现代中国思想理论的组成部分。对这些“回答”及其衍生的观念进行比较研究,不仅对于研讨杜威哲学与现代中国哲学之间的关系有意义,不仅对于深入理解杜威哲学有意义,而且对于探讨中国的现代性发展及其未来走向也有意义。

根据上述有关研究方法和内容的设想和所受的启发,笔者将自己的研究课题设计为“现代新儒学与杜威实用主义实践哲学比较研究”,试图运用同时代性的研究方法,也试图把以前忽视的一些重要概念、观念纳入讨论范围。当然,上述设想只是触发本课题研究的因素,在实际的研究过程中,本书所涉及的研究方法与话题(概念)并不仅仅局限于上面提到的内容。

二 研究对象:现代新儒学与实用主义

本书的研究对象是现代新儒学与杜威的实用主义。下面分别对这两种哲学流派的概况及其相互关系做一些说明。

先说实用主义。

实用主义的英文是 pragmatism。根据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解释,16世纪出现的英文词 Pragmatic,具有多重含义,如(1)指国家的政令;(2)指代理商或生意人;到了17世纪,作为形容词的 pragmatic 有了更广的含义,如指(3)“实际的”“有用的”;(4)指好管闲事的;(5)指固执与武断;到了19世纪,还有一个含义,即(6)指用来描述有系统的历史研究。其中,含义(4)与(5)现在已经不用了。^①含义(1)和(2)与实际生活相关,不是指纯粹抽象的东西。

① [英] 雷蒙·威廉斯:《关键词》,刘建基译,三联书店,2005,第361~363页。

从词源学上看, pragmatism 出自希腊文 $\pi\rho\alpha\gamma\mu\alpha$, 本为“行动”的意思。practice (实践) 和 practical (实践的) 也从这个希腊词派生而来。pragmatic 原先含有“实践的”内涵, 后来在康德的意义上独立出来并与 practical 相对。康德明确了 pragmatic 和 practical 的区别: “后一个词被应用于道德法则, 康德认为这些法则是先验的; 前一个词则被应用于技艺和技巧的法则, 这些法则建立在经验之上, 并被应用于经验。”^① 康德的实践概念是狭义的, 仅指道德实践而非技术实践或日常生活, 适用于先验道德律, 实践规范即道德律, 是理性的产物, 与经验没有关联。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举例说明“实用的信仰”(pragmatic belief), 以显示其和道德实践的不同。他说: “以事物为真实云云在理论上并不充足而能名之为信仰者, 仅自实践的观点言之耳。此种实践的观点, 或与技能有关, 或与道德有关, 前者与任意的偶然的有关, 后者则与绝对的必然之目的相关。”^② 举例来说, 医生看病, 起初不知病之性质。为对症下药, 总要询问病人的种种情况, 如生活起居, 观察其种种症候, 如舌苔神色, 以自身行医之经验, 最后判断为肺病, 于是下方抓药。但是这一断定实乃一信仰, 且仅为偶然的。“其他诊断者或许能有较为健全之断案。此种偶然的信仰, 构成某种行动之实际的行使方策之根据者, 我名之为实用的信仰。”^③ “实用的信仰”发生在经验世界之中。

基于词源学的差别, 并试图与康德哲学的理解有所差别, 美国哲学家皮尔士当初没有同意他的一些朋友的建议, 即用 Practicism 或 Practicalism (即实践主义) 来命名他的哲学, 而使用了 pragmatism 这个词。他是这样解释的: “对于像我这样一个从康德那里学习哲学并习惯于以康德学说的术语来思考的人来说, ‘实践的’(praktisch) 和 ‘实用的’(pragmatisch) 之间相距悬殊。绝大多数对哲学感兴趣的实验科学家也持同样的看法。‘实践’适用于这样的思想倾向, 在那里实验科学家根本无法为自己建立坚实的基础, 而 ‘实用’则表达了与人的特定目标的联系。

① [美] 杜威:《美国实用主义的发展》, 载《杜威文选》, 涂纪亮编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第3页。

② [德]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 蓝公武译, 商务印书馆, 1960, 第565页。

③ [德]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 第565~566页。